



数字经济



全球第二——

我国数字经济底子还须继续夯实

本报记者 崔吕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让数字经济在助力抗疫的基础上，点燃了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根据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数据，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

好成绩一目了然，但为什么谈及数字经济底子，多位委员强烈建议要补课呢？

不要开口闭口说自己的技术是“国际首创”

“我一直认为，我们的企业不能在特定环境下做了一点事儿，就到处吹牛。咱们得知己知彼，知道自己差在哪儿，需要保持危机感和奋斗精神。”谈及这一话题，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科技部原副部长曹健林直言不讳。

谈数字经济，曹健林的切入点是从夯实基础技术。

“现在看，我们之所以能在数字经济领域取得一定成绩：首先源于体制优势，尽管我们自己还有成长的烦恼，但我们同时拥有国家政策的强大推动力；其次是体量优势，我们拥有足够多的大数据做基础支撑；再次，我们拥有基础设施优势，这要感谢新中国成立以前前辈们所打下的基础。”曹健林这样说。

但劣势同样明显。数字终端产品方面，我国在全球市场体量最大，手机、电视、电脑包括一部分机床，中国在全球市场占比超50%，拥有绝对竞争力。但构成数字产品中最重要的元器件芯片，以及基础软件、操作系统、光刻机等领域，亟待追赶上来。

“大量公司集中在应用层面，而在关键器件的生产方面，是越往上游走难度越大，差距也就有可能拉大。一些企业

业开口闭口说自己的技术‘国际首创’。我觉得科技界应该对标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以此类推，中国人的数字经济也同样需要建立在中国技术的基础上。如果从这点出发，我们真的需要长时期、大量的投入和支持，尤其是聚焦基础技术，要在核心装备、关键材料以及基础软件上下大力气，必须支持关键基础领域中的基础学科，包括超精密机械、超精密光学、应用数学。并且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件事都要保持高度重视，发达国家政府对于夯实技术基础的重视程度，值得我们学习。”曹健林快人快语。

要实现我国芯片产业突破只能靠自己

“在国家刚刚发布‘东数西算’工程的背景下，DPU（即Data Processing Unit，是大数据中心最重要的算力芯片）的研发和产业发展迫在眉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研究员曲伟结合热点时事，直奔短短板话题而来。

“在大数据、云计算高度竞争时代，在海量数据处理运算竞争领域的较量，甚至可以被视作国力之争。”用曲伟的话说，之所以力推释放DPU潜力，是因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尚有较大差距，但在DPU芯片发展上却有较大机会，目前，头部企业在DPU研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继续努力不仅有机会实现“缺芯”现状，还能推动我国通信网络、工业互联网、智能汽车、智慧医疗、边缘计算等诸多领域向前发展。

“这条路再难也要走，别人能走，我们也能走，因为只有走过去，才能带动我

国相关产业实现绿色发展的引领，才能使我们从硬件上消除国家数据中心安全隐患。发达国家对我国芯片研发和产业不断打压和遏制，要实现我国芯片产业突破，只能靠自己！”曲伟这样说。

“最先一公里”跑通 “最后一百米”才能落地

“近年来，我国在工业大数据引领和催化方面发展迅速，在集成应用和生态培育等多领域成效初现，但据我观察，挑战也是现实存在的。比如工业制造会产生大量数据，但由于设备种类的差异，工业数据来源、制式变得很复杂，数据兼容不了，就会使得大量数据‘沉睡’在哑巴设备上，难以采集。”谈及数字经济，全国政协委员、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提升制造业数智化水平，或许才是提升实体经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而为了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数智化水平，沈南鹏认为，当务之急是加快推动工业传感器和通信协议兼容适配，以技术改造和新技术强化数据支撑能力。

“建议有关部门牵头，支持解决异构数据联网的技术试点示范，鼓励优先在增量国产工业设备中推动不同协议和接口兼容；在重点制造行业遴选一批智能示范工厂，推动以关键工序数控化、生产线柔性适应等技术改造工程。同时，也可以整合行业资源，推进数据脱敏、差分隐私、同态加密等隐私计算技术在工业数据安全共享的落地应用。”沈南鹏如是强调。在他看来，只有“最先一公里”跑通了，“最后一百米”才能顺利落地。

界别关注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实现更高质量前行

——委员呼吁深挖数据价值与完善治理并进

本报记者 孙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在全国政协委员张懿宸看来，数据是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要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就要在如何更有效地挖掘数据资产价值上下功夫，使之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数据只有在使用加工和流通的过程中，才会产生价值。2021年，上海率先成立数据交易所，开始了数据流通和交易领域的有益尝试。但正如张懿宸所说，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仍有很多难点要迈。“首先要解决的是个人领域数据价值过度开发，而产业领域发掘不足。”他举例说：“如在涉及消费、金融等个人领域，数据价值已被充分挖掘，但在产业领域还远远不够，形成极不平衡的现象。”

此外，数据仍沉淀于单个企业和区域，各个企业、地方热衷于搭建各自的数据中台，除服务自身的管理需要外，大量数据储存在企业或区域内部，成了

“沉睡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近几年，随着产业互联网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开始有意集合上下游数据，这不仅可以更好地为企业经营决策、行业健康发展服务，同时，也能为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决策依据。但正如张懿宸所说，与此同时，也出现企业在集合上下游数据之后，却建立了“数据高墙”，对外合作共享意识不够，这也导致了数据流通不足。

为了更好地让数据流动起来，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张懿宸表示，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尤其是数据资产确权的全民法立法，同时鼓励探索科学合理的数字交易估值体系和方法，并按照国家原则，引导社会资本继续加大对数据技术创新的投入。

在鼓励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同时，记者发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数字经济治理，释放数据要素潜力，更好赋能经济发展、丰富人民生活。”这是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到“完善数字经济治理”。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严望佳表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应与完善治理并驾齐驱，

可通过科学的管理与评价推动科技治理。因此她提出，可通过建立权威数字经济指数（DEI——Digital Economy Index），引领数字化高质量发展。

从实际情况来看，目前社会各专业机构已纷纷推出自己的数字化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来评估和平衡经济健康发展的措施成效。但严望佳发现，当前各类分散、异构的评价体系往往缺乏权威性、统一性，甚至有些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是从地方发展或商业利益驱动，不能体现评价的全局性、客观性，这对于完善数字经济治理评价体系，国家数字经济整体发展，尤其是高质量发展都不具备很强的指导意义。

因此，严望佳提出，当前亟须建立权威、科学的“数字经济指数”和全面评价指标体系。“建议由相关部门牵头，统筹各研究机构、智库等相关单位，统一思想，联合共研，制定出一套权威高效的数字经济指数EDI和评估方法；同时通过先行试点，逐步完善数字经济指数DEI，有序推动数字化指标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中的落地，为推进数字化健康、安全和高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量化的、有针对性的参考依据。”严望佳最后说。

全国人大代表朱立锋：

加快国家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

本报讯（记者 高杨）如何保护国家数据安全，鉴于数据安全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立锋建议：

完善制度规则体系。根据数据处理活动模式和技术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完善相关法规，提高法规的覆盖面和实用性。各立法主体应加强沟通协调，提高法规的普遍性和统一性，避免出现同一主体在不同地区、行业和领域差异过大，影响法规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可执行性。

建立综合治理体系。按照“关键数据入库、双向风险隔离、三级安全管控、五大保障系统”的

数据安全核心理念开展积极探索，构建安全栈式数据安全合规体系，为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安全保障。

建强基础设施体系。建议各级政府按照系统性、工程化理念，构建“一库、两网、三级节点”的数据金库国家基础网络，实现数据归集和数据要素流通全程可控。

打造产业生态体系。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原则，围绕数据安全和数据合规技术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建立覆盖基础网络、数据中心、云平台、数据和应用的协同一体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宋海：

技术驱动管理变革提升数字经济效能

本报讯（记者 康维亮）“数字化转型不是简单的信息化升级，而是体制机制、管理流程、组织架构的深刻变革。”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建中央原副主席宋海在今年提交政协大会的《关于打造数字经济整体战斗力》的提案中提出，数字战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未来的核心竞争力，而想要获得高分数字战斗力，则需要全面的数字化转型，以数字化治理企业。

在提案中，宋海列举了在会员企业金蝶集团调研时了解到该企业“用数字战斗力，向管理要效益”的情况。“这家企业帮助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打造一体化协同管控平台，将产品组装机周期缩短30%，作业准时完工率提升至96%。”

宋海分析，正是有了数字化管控平台的支持，中国企业能够在与西门子、阿尔斯通、庞巴迪等这些全球行业巨头的市场竞争中，交付周期缩短到对手的一半，以更优

的性价比脱颖而出，从而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实践表明，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构核心竞争力——即足够强大的数字战斗力，方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推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为此，宋海建议，一是加快制定数字化转型的顶层设计，将管理的数字化变革纳入到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考评标准之中，从国家顶层设计角度提供目标指引和制度保障；二是利用国家政策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从加快技术应用步入管理变革的道路，总结推广并鼓励金蝶等民企输出更多已形成的数字化转型方法论，并借助技术平台不断提升政企机构在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员工效能、生态协同、万物互联、分析决策的能力；三是发挥国企带头示范效应，优先进行管理数字化变革，打造数字战斗力样板，同时带动广大中小企业快速、高质量地从数字应用向数字技术与业务深度融合阶段迈进。

全国政协委员朱鼎健：

“数字+旅游”助力旅游全产业链发展

本报讯（记者 刘圆圆 实习生 宋泽晖）“数字经济提振加速，驱动了多产业融合，也成为助力旅游全产业链发展新的突破口。”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如是说。

朱鼎健表示，通过数字经济，可以拓宽旅游产业的广度和厚度，并带来全新的旅游体验。基于物联网、5G、VR、AR等数字科技手段，可以整合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连接现实场景与虚拟场景，实现本地空间与异地空间的融合，实现一景多看、旧景新看、古景今看，创造旅游新场景、新体验、新业态、新商机，从而提高旅游产业自身韧性。

朱鼎健建议，国家文旅部就“数字+旅游”进行全方位的顶层设计，扩大专项资金支持企业进行数字旅游项目、产品的开发，建设数

字旅游景区，组建旅游业数字化联盟，推动旅游产业实现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数字化。文旅部应特别引导传统旅游景区、景区开展数字化建设，对利用开展数字旅游项目的优秀企业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让旅游产业与时俱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国家文旅部还应与教育部门合作，采用“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协同培育旅游产业领域的数字化人才，依托优秀的旅游实践项目，提升数字旅游人才的实践管理能力和协调沟通能力。

此外，朱鼎健还建议，应加强游客、企业、政府三方共赢的数字化诚信体系建设。“加强旅游企业数字化诚信体系的推广和宣传，让更多的旅游企业加入到诚信体系的建设，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旅游产业良性互动。”

全国政协委员蒋志鹏：

建议厦门探索建立离岸数据中心

本报讯（记者 照宁）“在参与政协调研和相关专题协商时，我一直对数字经济的议题很感兴趣，今年两会我带来一件《关于支持厦门数据中心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展的建议》的提案。”全国政协委员蒋志鹏告诉记者。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和驱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主导力量。但由于我国对数据资源和全球网络路由的掌控能力较弱，迫切需要建立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数据枢纽，以保障在大国博弈中获得维护数据主权的主动权。

“厦门有经济特区、自贸试验区、综改区等多区叠加的政策优势。”蒋志鹏委员在调研中发现，厦门是“数字中国”的萌发地、孕育地之一。据统计，2021年，厦门数字经济规模突破4000亿元。在数字产业化方面，厦门持续打造“芯—屏—端—智—网”产业生态体系，形成平板显示、半导体与集成电

路、计算机与通讯设备、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四大特色产业。因此，借数字经济的“东风”，将厦门打造成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改革先行示范区，有利于为“数字中国”建设和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样板示范。

“恳请国家支持在厦门建立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蒋志鹏委员建议，支持将厦门纳入国家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体系，为闽西南区域及两岸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算力支撑，助力东南和两岸地区数据流通融合、算力资源服务化和大数据应用创新，构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创新生态。厦门可试点建设离岸数据中心，在自贸片区等特定区域打造跨境大数据存储处理基地和国际数据枢纽，带动发展跨境数字贸易、国际金融、离岸数据服务外包、互联网创新孵化等相关联业态发展，服务国家安全大局利益，发挥数据要素创新驱动改革“排头兵”的作用。